

中国老区

第三章 晋绥抗日根据地

(初稿)

《中国老区》山西编写组编写

第三章 晋绥根据地

(1937年9月至1949年8月7日)

第一节 晋绥抗日根据地概况和重要战略地位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它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和绥远省(今为内蒙古自治区之西部)。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至同蒲铁路、平绥铁路(即今京包线)的大同至集宁段,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相接;北达祖国北疆百灵庙、乌兰花一带;南到黄河、汾河三角地带的黄河渡口风陵渡。全区纵长2千里,横贯5百里,面积20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余万,根据地中心地带晋西北人口300多万。晋绥抗日根据地由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三个地区组成。其中,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于1938年秋向北延伸发展开创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是同时开创的。从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到1940年前,这两块抗日根据地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是互相支援、唇齿相依的。1940年后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西南成为阎锡山统治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晋西南的日伪军展开反攻,推翻了和日伪军合流的晋西南阎锡山反动政权,解放了晋西南,晋西南就成为晋绥解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晋绥抗日根据地(不包括晋西南地区)管辖50个县,其中,晋西北36个县:神池、朔县、偏关、岢岚、五寨、保德、河曲、临县、临南(今临县南部)、离石、方山、离东(今离石东部)、阳曲、交城、交西(交城西部)、汾阳、文水、清徐(今太原市清徐县的一部分)、太原、祁北(今祁县北部)、榆太(今榆次、太谷边境)、静乐、静宁(今静乐、宁武边境)、宁武、忻县(西部)、崞县(今原平县西部)、右玉、右南(今右玉县南部)、左云、平鲁、山阴(今山阴、朔县边境)、怀仁、大同、兴县、岚县、神府(由陕甘宁边区神木、府谷县一部分组成,1941年5月划归晋绥边区)。绥远境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辖9个县、5个蒙旗,其中有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武川、陶林、凉城、集宁、丰镇等。

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晋绥抗日根据地,中部是绵亘不断的山脉,第一个

大山脉是吕梁山，北起于岢岚、岚县一带，南至晋西南的乡宁、河津，全长 400 公里，位于黄河与汾河之间，海拔 1500 至 2000 米，主峰关帝山海拔 2830 米。东西宽约 30 至 100 公里，形成一大分水岭。在此分水岭以西，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即晋西北区。第二个大山脉是管涔山，处于吕梁山脉北端，山势高峻，海拔 2000 至 2500 米，荷叶坪高峰海拔 2784 米。管涔山脉北起宁武一带，往东经雁门关、繁峙县，与五台山脉相衔接。晋绥抗日根据地境内有大同盆地、忻崞盆地、太原盆地的一部分，这些平原，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都是日寇统治最强的地区。抗日军民牢固占领的晋西北地区，处于黄土高原，黄土厚度超过 50 米，局部地区达到 100 多米。土质松软，植被稀少，大部均系荒山秃岭，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被雨水冲刷切割，形成沟壑纵横，地形破碎，呈梁峁丘陵形状和陡峭的山坡，农作物产量很低。故而交通不便，地瘠民贫，经济文化非常落后。黄河流经之晋西北六县，河床低，耕地高，均得不到灌溉之利。但由于地广人稀，当时大部分县并不缺粮，还有余粮向陕西、绥远、太原等地销售。除岢岚、五寨、方山等少数县外，大部分县都产煤炭，还有铁、锰、硫磺等矿产。吕梁山区还是山西省的木材产地和畜牧基地。抗日战争前，修筑同蒲铁路的枕木，各地的电线杆，太原建筑和家具用的木材，西北实业公司火柴厂用的木材，大半采自宁武、方山、交城的天然森林。阎锡山时代的山西省政府办过四个公营牧场，即有三个设在晋西北。

由于这个地区崇山峻岭，交通险阻，地方偏僻，抗日战争中，就成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理想的地区。日军的机械化武器，如坦克、大炮、飞机，受地形限制，作用大为降低，甚至失去作用。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好弥补了中国军队的短处，它便于抗日军队和人民的防守，可以发挥抗日军队步枪、手榴弹的威力。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怕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所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八路军进入晋西北后，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创建抗日根据地，而且成为敌后长期坚持抗战的巩固的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重要堡垒之一，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晋绥地区虽然地瘠民贫，思想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但是这里的人民富有革命斗争传统，建立抗日根据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由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长期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一贯对共产党和人民实行残酷镇压的白色恐怖政策，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上晋绥地区偏僻闭塞，进步思想很少传播，但是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吕梁山区和绥远省的个别地方，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即系晋西北的静乐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绥远特委、中共内蒙古特委。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双重领导下，建立了中共西蒙工委、中共西北特委，傅鼎、乌兰夫先后任西蒙工委书记。在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绥远特委、中共归绥中心县委、中共绥远

省工委等党的组织。在晋西北地区，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方是汾阳县和崞县。

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贺昌（晋西北离石县柳林镇人，现为柳林县），受太原党组织派遣，赴汾阳县工作，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组织爱国游行，批准汾阳县公立河汾中学学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汾阳县支部书记李舜琴（山西省平遥县人）转为共产党员，他是晋西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美国传教士用“庚子赔款”在汾阳县办了铭义中学、崇德女校、神道学校等，由于受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影响，铭义中学等这些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工具，却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汾阳县东九枝村青年武子程，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结识了李大钊，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从北京购回大量的马克思著作和革命书刊，传送到铭义中学图书馆。他利用在汾阳县美国人办的广智园和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便利条件，在铭义中学学生中进行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使汾阳县出现了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1925年初，武子程到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北京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山西汾阳特别支部，武子程任书记。从1925年到1926年，铭义中学学生中先后发展的共产党员有：韩寿萱、杜瑞光、文九荣（女）、李伯生、李旭东、刘有刚、李正旺、王森、贺裕秀、高如山、霍文新、冯家升、曹维麟、任子舜、申其浩、杨国瑞等。1926年下半年，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党员增加到30多名，并在铭义中学、河汾中学、神道学校、崇德女校和市面（由县城工厂、商店、医院组成）等，建立了5个基层支部。这年，中共汾阳特支派出党员李伯生、刘有刚、高如山、王森、李正旺、霍文新等，陆续建立了离石县柳林镇、临县碛口镇和曲峪镇以及孝义、文水等县的党支部。1926年底，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把中共汾阳特支改为中共汾阳地委执行委员会，党员发展到50多人。中共汾阳特支和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同时也受中共太原地委指导。1927年后，中共汾阳地委改归中共山西省委领导。1927年6月至7月间，阎锡山实行“清党反共”后，中共汾阳地执委领导人李伯生、刘有刚、李旭东及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藏或转移到外地，有的英勇牺牲，多数党员失掉党的关系，武子程于1928年向国民党自首叛变。但到1928年10月，汾阳党组织同中共山西省委保持联系的仍有7人。这些党员一直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汾阳县党的组织仍有重要活动。1930年11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发生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失败后，冯玉祥率部从河南进驻山西汾阳县，开办军官学校。冯玉祥的军官学校中有中共秘密组织，党员20多人。1931年4月，中共山西特委派原中共汾阳县委书记、原铭义中学学生王森到汾阳等地恢复失去联系的党组织与党员，由于冯玉祥军校共产党员杨国瑞，是在铭义中学时由王森介绍入党的，这样就使冯玉祥军校中共秘密组织与中共山西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中共山西特委以汾阳冯玉祥军校为依托，成立了中共汾阳军事工作委员会。1932年2月，中共汾阳军事工作委员会改建为中共汾阳临时县委，不久

又改为中共汾阳区工委，受中共山西特委和中共河北省委（代北方局）双重领导。中共汾阳军事工作委员会、汾阳区工委，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持了1931年5月在孝义县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以及陕北红军。汾阳区工委领导冯玉祥军校党组织和汾阳、介休、孝义、离石、临县等地党组织，负责开展山西、陕西边境工作，组织游击队，打土豪，为党筹款，与陕北红军联系，扩大党的组织。到1932年，汾阳区工委在冯玉祥军校和各县共有党员110多名。1933年初，冯玉祥军队离开汾阳，开赴察哈尔抗日前线，中共汾阳区工委成员大部随军北上，工委结束工作。但在这以后，汾阳县仍有少数共产党员同中共山西特委保持着联系。铭义中学党的组织仍然存在，并且还个别地发展党员。铭义中学的党组织，一直和后来抗战开始重新建立的中共汾阳县委相衔接。

在崞县（今属山西原平县）中学，1926年8月，经中共太原党组织负责人王瀛介绍，发展这个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刘葆粹加入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崞县中学党支部，不久发展李兴唐（黎玉）、李三楼等8人为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崞县特别支部。1928年3月，国民党逮捕了李兴唐、李三楼等7名共产党员，因未暴露身份，1929年被释放，考入北平法学院，恢复了党的关系，他们后来都在外地从事党的工作。李三楼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故乡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毛少先支队政治委员、一二〇师独立二旅供给部政治委员等职。1930年、1933年，中共党员李志敏、邢尚志，受上级党组织委托，回到故乡崞县，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1933年9月，中共山西特委派李舜琴来到崞县，重建了中共崞县特别支部，李舜琴、邢尚志、张挺秀相继担任党支部书记。直到1935年春，由于阎锡山的镇压，党组织才停止活动。

晋西北地区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仅一河之隔，陕北共产党组织亦经常派人来晋西北沿黄河各县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1933年到1935年，陕北党组织在吕梁山区柳林镇和离石、临县、兴县、岚县个别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其中兴县赵家坪、碾坞、次己山、桑湾等村发展共产党员近百名，建立了十几个支部。这些党支部为陕北红军提供情报、购买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对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35年，阎锡山在兴县杀害了70个反抗其统治的群众，其中有30多名是共产党员。陕北党组织在离石县薛家坪一带，从农民、船工、手工业工人中发展党员30多人，成立了中共河东支部，后改为河东区委，他们也为陕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离石县还有从1925年到1932年在北平、太原、汾阳加入共产党的王达成、韩昌泰、高如山，受上级党组织委托，在家乡先后发展党员30多人，建立了中共离石县委和中共离石县支部。这些党组织也交给陕北党组织领导。除个别人后来叛变，少数人消沉、自动脱党外，抗战开始，陕北党组织移交给新建的中共山西省离石县委党员50人左右

1936年2月20日到5月初，中国红军主力为了与日军作战，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实行东征。遭到

阎锡山、蒋介石军队的阻击。东征红军南到晋西南新绛县，北到晋西北保德县，转战晋西北、晋西南 50 多县，扩大红军 8000 多人，在与晋西北相连的石楼、中阳、交口县（由原隰县、灵石、孝义县边境组成）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红军东征期间，参加了红军的山西青年，其中有数百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他们中许多人受党的派遣，回到晋西北、晋西南从事建党工作。红军东征，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晋西北、晋西南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开辟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6 年 10 月，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 5 人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到太原接办了原由阎锡山出面组织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使山西各地包括晋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1937 年“七七事变”前后牺盟会的县特派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到晋西北各县发动群众抗日。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合作形成。1937 年 8 月 25 日，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中央经过同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三个师挺进山西北部前线，保卫山西。当八路军三个师开赴山西前线的时候，日军一路沿平绥路西进，一路沿平汉路南下，一路沿津浦路进攻山东。这时，晋北、大同已经论陷。中共中央洞察日军的意图是首先占领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进而占领整个华北。为此，确定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放在山西，晋绥地区的战略地位随之突出起来。1937 年 9 月 16、17 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集中在恒山山脉的计划必须改变，八路军三个师应分别配置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根据地。这样，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日军侧翼的机动地位，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态势。其中，“一二〇师应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由于在日本侵略者进攻的威胁下，阎锡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同阎锡山的合作，使群众性的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首先在山西蓬勃发展起来。这一发展，突出表现在通过牺盟会掌握了部分地方政权，建立了分布于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的山西新军。新军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新军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八路军派干部参加了新军，担任了领导职务，形成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军队。

1937 年 9 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到达山西，向阎锡山提出建立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建议。9 月 20 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或战动总会）在太原成立，其动员区域包括绥远、察哈尔、晋西北、雁北和晋东北。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后 2 人为常驻委员）4 人。战动总会保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拥有

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各级动委会在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巩固抗日政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东可以控制同蒲路,与晋察冀根据地、太行、太岳根据地互相呼应;西与陕甘宁边区隔河接壤,是阻止日军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屏障,又是中共中央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晋西北根据地向北延伸到绥远后,便成为保卫大西北,沟通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联系,建立国际交通线,并成为战略反攻时,后方与前方联络的一个重要枢纽。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决策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在地理条件、群众基础、党的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有着许多优越的条件。实践证明,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第二节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发展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是从1937年9月底,八路军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开始的。根据地的诞生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37年9月底到1940年初,为创建时期;1940年初到1942年为巩固时期和困难时期;1943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恢复和发展时期。

一、创建时期的斗争

1、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建立根据地

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恢复失地,把武装斗争和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相结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这就是晋绥抗日根据创建时期的特点。

中共中央决定,由一二〇师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该师是由红军第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等部编成的。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师长肖克的领导下,全师14000人,除少部分兵力留在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共中央外,师主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8200多人,于1937年9月3日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经韩城的芝川镇东渡黄河,到侯马乘火车北上,9月19日到达忻县,9月28日到达神池集结。这时,由于驻守山西北部国民党数万军队全线溃退,日军长驱直入,十几天中就侵占了大同和雁北13座县城,并越过内长城,攻打雁门关、阳方口一线。9月底,一二〇师派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团长宋时轮率领一个营,组成雁北支队,人称宋支队,挺进雁北西部,开展游击战争。10月1日,收复平鲁县井坪镇,10月4日,收复平鲁县城。在贺龙指挥下,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主力在

神池以西、五寨以北打击日寇。10月8日,收复宁武县城;10月14日,攻占同蒲路上的大牛店等地。10月18日至21日,三五八旅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大同至代县的敌运输部队,毙伤敌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切断敌由大同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与此同时,三五九旅也在阳明堡以南伏击敌运输队,毙伤敌300余人,毁敌汽车30余辆(三五九旅在此以前归八路军前方总部指挥,在五台地区活动)。这样就迟滞了日军的向南进攻,拖住了日军侵略者的牛尾巴,挽救了危局,安定了民心,随即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政权,恢复了社会秩序。

贺龙指挥一二〇师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线后,一一五师打击了河北蔚县至山西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军队的忻口会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忻口战役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说:“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宋时轮支队依托洪涛山,在大同、怀仁和山阴县的岱岳镇之间,不断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破坏了朔县至宁武的铁路三四十里,有效地阻击了日军南进的锋芒。宋支队驰骋雁北7个月,在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大同附近和岱岳地区,建立了几个小块抗日根据地,大小战斗百余次,毙伤敌人2000以上,摧毁敌人汽车390余辆,破坏铁路、列车及所载物资,总值数百万元,缴获了不少武器。宋支队的战斗实践证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抗日根据地,是分散敌人主力,削弱和疲劳敌人,壮大自身力量,发动千百万群众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有效方法。敌后游击战争优于正面抵抗。宋支队成为被敌人摧残的广大雁北人民群众心中的支柱。

为了配合友军正面作战,一二〇师还参加了太原保卫战,太原失守后,继续在太原附近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2月18日至27日,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按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太原至崞县间的同蒲路北段展开破袭战,拆毁铁路10余公里,攻占了平社、豆罗车站和麻会、关城、石岭关等敌军据点,歼敌400余人,俘虏日军10余人,控制了麻会至高村间的铁路、公路20余公里,并在崞县、宁武、忻口间歼敌百余,炸毁火车三列,汽车10余辆。日军乘一二〇师主力在同蒲路北段作战之际,为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把一二〇师驱逐到黄河西岸,2月下旬,日军从大同、朔县、汾阳纠集万余兵力,又加绥远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人,分五路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攻。从2月21日至3月2日,攻占了宁武、神池、五寨、保德、河曲、偏关、岢岚7县县城,并占领离石,向碛口、军渡进攻。当时在晋西北的同锡山4个军,除三十五军稍作抵抗外,其余均先后撤退。贺龙、关向应闻讯,2月29日立即率部返回晋西北,和战动总会、牺盟会游击队一起,采取围困战,断敌补给,迫敌出逃,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原则。从3月15日至4月1日,先后收复岢岚、

五寨、偏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7座县城。这次战役，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一门，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百余匹。收复晋西北7县城之战，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短短半年时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巩固地建立起来了。

1938年4月18日、5月14日，毛泽东两次致电贺龙、关向应、肖克、朱德、彭德怀指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大青山位于横贯绥远省全境的阴山山脉中段，东起集宁东北的灰腾梁，西接包头以西的乌拉山，北麓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与晋西北山水相连，东西长700里，南北宽百余里，面积9万3千平方公里，人口约140万，其中汉族130万，蒙古族13万多。大青山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北翼。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可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可以团结蒙汉民族共同抗日，还可以打通国际交通线，成为中共中央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联系的通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决定，6月，组成了由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为司令员的大青山支队。支队主要武装是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还有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战动总会第四游击支队。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组织了中共大青山特委，战动总会组织了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都随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敌占区。部队及工作人员共2300余人，于8月出发，9月初越过平绥路，到达大青山，与共产党员杨植霖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相会合。到1939年初，大青山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2000余人，初步肃清了当地土匪，开展了建党、建政和组织地方武装的工作，得到蒙汉人民群众的拥护，在绥南、绥中、绥西建立了三块游击根据地。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位于汾离公路以南，风陵渡以北，同蒲路以西，黄河以东。面积29000多平方公里，人口300余万。辖中阳、孝义、石楼、永和、隰县、吉县、大宁、蒲县、乡宁、汾西、汾城、新绛、稷山、河津、万泉、荣河、猗氏、临晋等18个完整县，离石、汾阳、灵石、赵城、洪洞、临汾、襄陵、安邑、虞乡、永济、解县、闻喜、夏县13个半边县。自然条件优于晋西北，汾河盆地有“山西粮仓”之称。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是在中共山西工委、山西省委、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大力支持下，于抗战初创建的。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取得平型关大捷后，10月中旬，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忻口战役。10月下旬，驰援娘子关，由于国民党军队败退，11月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林彪的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不应在东边恋战，宜立即向吕梁山脉转移。11月9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由正太路南进，适时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1月下旬，八路军总部、林彪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到达赵城、洪洞一带，之后，又转到汾

阳、孝义，师部驻孝义县碾头村。在这年10月下旬，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率领总政民运部、总政教导大队（随营学校）到达汾阳、孝义。总政派出工作团在汾阳、孝义、隰县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派出八路军干部，领导孝义、平遥县牺盟会组织的游击队，开始了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的的工作。1938年1月，罗荣桓率一一五师政治部到达洪洞、赵城。一一五师师部也派出工作团，与中共山西省委密切联系，并和新军决死二纵队配合，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抗战开始前后，中共山西工委、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向晋西南派出大批党、政、军干部，开展建党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太原失守前，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都转移至临汾，临汾失守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与中共山西省委转移到晋西南的孝义、吉县、乡宁一带，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和八路军总部，都曾在晋西南活动，为创建晋西南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2月中旬起，日军第二十师团、一〇九师团向晋西南发起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隰县、军渡、碛口。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一一五师师部率领三四三旅立即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一面保卫黄河河防，箝制日军行动；一面发动群众，在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3月初，林彪为国民党军哨兵误伤离职休养，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负责全师领导工作，陈光任代师长，六八六团团团长李天佑任三四三旅代理旅长，政委肖华。罗荣桓、陈光率领三四三旅在蒲县、大宁的午城、井沟等地同日军连续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敌汽车70余辆，缴获山炮2门及枪260余支。午城、井沟的胜利，迫使大宁日军东撤，保卫了黄河渡口，这对开辟晋西南根据地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大意义。这年9月，日军沿汾离公路西犯，再次企图西渡黄河。一一五师在罗荣桓、陈光指挥下，先后在汾离公路的薛公岭、油房坪和王家池三战三捷，毙伤日军旅团长山口少将以下1200余人，把敌人从黄河边拖了回来，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

2、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抗日政权，改造旧政权。

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首先要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要有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由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地区在抗战以前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共产党地方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和改造旧政权的工作，便成了一二〇师、一一五师担负的主要任务，起了主要作用。牺盟会、动委会和一二〇师、一一五师密切配合，一二〇师、一一五师也依靠牺盟会、动委会进行工作。所以，牺盟会、动委会对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

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一二〇师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1937年10月1日,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率领师政治部大部和教导团700多人组成地方工作团,分赴岢岚、岚县、兴县、五寨、神池、保德、河曲、偏关、崞县、宁武、忻县、静乐、临县、朔县等14县,发动组织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扩大八路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等各部队也派出工作团,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大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关向应、甘泗淇率领的工作团在晋西北进行了8个多月的工作,先后建立了中共晋西北工作委员会、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中共晋西北省委(1938年秋改称晋西北区党委)。一二〇师各工作团和中共晋西北地方组织结合,先后建立了中共各县临时县委或县委,以及区、村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一二〇师地方工作团、中共晋西北地方组织、牺盟会、动委会协同一致,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抗战,收容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恢复了社会秩序。由于阎锡山的旧政权人员在日军进攻时逃走,一二〇师工作团便支持动委会代行政权职能,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没收汉奸财产,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一二〇师的英勇作战和地方工作团的深入群众,使共产党、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群众认识到,照共产党的主张办事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掀起了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潮。县、区、村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抗日儿童团。到1938年冬和1939年春,晋西北的农民、青年、妇女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广大群众都团结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周围。

日本军队的野蛮屠杀,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仇恨。经过一二〇师工作团的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变成武装起来的实际行动,群众武装迅速发展。一二〇师派干部对各县游击队和自卫军进行训练,担任游击队的领导职务。各县共组织起游击队和自卫军11000人,八路军、山西新军也迅速发展。一二〇师由原来出师时的8200余人,到1938年1月整编,已扩大为25000余人。到这年6月,已扩大为29000人。三五八旅在崞县、宁武组织的忻崞独立支队,在汾阳、孝义建立的三泉游击队;三五九旅在忻县、崞县建立的崞县独立团,在神池、五寨建立的神五游击队,都编入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在雁北组织了3000人的游击队,大部也编入这个支队。山西新军中的决死第四纵队、工卫旅,战动总会在晋西北的抗日游击支队,到1938年上半年,则发展到26200余人。一二〇师、山西新军、地方武装力量,总计近7万人。另外,还有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65000余人。一二〇师

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此站稳了脚跟。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在一一五师支持下，通过牺盟会这个合法组织进行工作，使党的组织、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群众运动也迅速壮大，阎锡山旧政权很大一部分得到改造。到1939年11月，全区建立党的县委26个，区委83个，支部833个，共产党员由抗战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8000多人。新军决死二纵队由3个团扩大为9个团，建立了新军二一二旅、二一三旅。总计在晋西南的新军扩充为17个团，约2万余人。同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补充新战士3000人。1938年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后，以留在晋西南的三四三旅补充团为骨干，建立了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约有3000人。在乡（宁）吉（县）、中（阳）离（石）、洪（洞）赵（城）、汾（阳）孝（义）、隰县建立了五个地方游击大队。中共山西省委在晋西南积极进行改造阎锡山旧政权的工作，收到很大效果。1938年2月，临汾失陷后，阎锡山虽曾决定县长不能出县境，一定要在本县内打游击，协助军队作战，否则即另派人接替，但他的大批县长仍弃职离境。中共山西省委抓住这个机会，由牺盟总会出面，挑选了40名县牺盟特派员（多数是共产党员），举办了为期两周的县长训练班，通过牺盟会推荐，由阎锡山任命为县长。第六专区专员张文昂是共产党员，用他的名义，报请阎锡山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县长。这种县长，群众称之为“牺盟县长”或“抗日县长”。第六专区所属9个县，除永和县外，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乡（宁）吉（县）地区14个县，半数以上县长是共产党员。中阳、离石、灵石三县，一度也由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党的组织通过牺盟会，利用阎锡山“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的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土豪、劣绅、汉奸、恶霸作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赵城县发动几个区的群众，斗倒了恶霸郭辅堂。郭辅堂从1930年开始，就追随阎锡山，得到阎锡山的赏识。1936年红军东征时，任赵城县“防共保卫团”团长，杀害了许多群众。牺盟会发动群众清算他的罪行，向县政府控告，旧县长崔道修不予惩办。全县万余群众开大会要求公审郭辅堂，包围了住在赵城好义村的阎锡山省政府民政厅长邱仰浚三天三夜，终于迫使阎锡山批准枪毙了郭辅堂。这一斗争的胜利，大长了群众的志气，提高了党与牺盟会的威望。上述事实证明，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力量强大，发动群众相当充分。

3、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晋西北、晋西南各级组织和一二〇师、一一五师，在创建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坚持了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权，打破了蒋介石在兵力上对八路军的限制，壮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壮大了山西新军和群众武装的力量，牢牢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共产党成为根据地的核心力量。

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特殊形式的统一战

线。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表现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春对晋西北工作的指示说的：要善于利用阎锡山的合法组织形式和口号，放手进行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要十分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可以通过牺盟会、战动总会中的共产党员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其他活动；要作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阎锡山的旧政权、旧军队共同抗日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在1937年10月给贺龙、关向应及华北各地党组织的电文中指出：二在冀察晋绥已被敌人占领地区，“广大乡村并无日军或汉奸武装驻扎”，我们的地方工作方针应当“直接用共产党及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去动员群众。如在当地有友军友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即联合他们，并在战委会名义下共同去动员。”“在未被敌人占领地区”，“共产党与八路军政治部应该独立自主地去动员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当地共产党员尽可能用左派面目出现，如当地有友军及政治团体如牺盟会等，更应联合和推动他们去做，并可用战委会名义去做。”这里说的战委会，就是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刘少奇还说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是：要尽可能地通过阎锡山的组织形式，例如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阎的框框的限制。中共晋西北、晋西南各级组织和一二〇师、一一师在创建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最初的二年多中，正是按照毛泽东、刘少奇的上述指示做的，而且做得很成功。

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的二年多中（即1937年9月至1940年初），其特点是：一方面有强大的进步力量，这就是一二〇师、一一五师，新建立而又迅速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牺盟会、动委会以及各种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山西新军各部队，地方游击队；另一方面，在晋西北还有大批国民党军队集结，其中有阎锡山的骑一军、三十五军、十九军、三十三军、七十一师和东北军骑二军等，在晋西南有阎锡山带领他的省政府机关和十九军、六十一军、八十三军、教导师等。国民党的军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地方政权有阎锡山的二、四、六三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着晋西北、晋西南各县。在这种情况下，一二〇师、一一五师和中共晋西北、晋西南各级组织依靠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权，短时间内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牢牢掌握了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

一二〇师、中共晋西北地方组织积极支持和依靠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的战动总会工作。依靠战动总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就具有合法性、权威性。一二〇师各部队每到一地，首先从组织动委会入手，进行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工作。新建立的共产党县、区、村组织，也隐蔽在各级动委会中。晋西北各县的动委会，大都是一二〇师帮助建立的。1937年11月初，太原失陷前，设在太原的战动总会，先后转移到汾阳、离石，1938年2月下旬，又转移到岢岚，与一二〇师、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结合在一起工作，共同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战动总会的工作，重点就在晋西北地区。战动总会撤出太原时，阎锡山撤走他派到战动总会的人员，企

图以拆台的方式,使战动总会失掉统一战线的合法名义。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这时在太原,他对战动总会共产党的代表之一、战动总会组织部长南汉宸说:“你们拿到阎锡山的委任状,这是块合法的牌子,决不要停留在阎锡山限定的范围内,但是也不要超出范围太远……,以免过早同阎破裂。要把我们的力量发展起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战动总会转移到汾阳后,对战动总会武装部长、共产党代表程子华指示说:“阎锡山撤走他的干部,要拆台,我们不要上当。战地动委会的组织形式还需要,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战地动委会顾名思义,就是要活动在敌人占领的战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战动总会主任续范亭,真诚拥护共产党的抗战纲领,大力支持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的工作,他与共产党人融洽相处。他率领战动总会人员及战动总会所属的八个游击队到达晋西北,积极支援八路军一二〇师,保证了军队的吃穿,保证了一二〇师收复晋西北7县城的胜利。战动总会所属的游击队,配合一二〇师投入收复晋西北7县城的战斗,做出了贡献。动员农民参军,源源不断地补充抗日军队,是战动总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38年3月,战动总会在岚县召开了动员新战士联席会议。会议由续范亭主持。根据各部队要求,决定动员新战士13800人。各县动委会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实际动员新战士2万余人。新战士的分配,既有八路军一二〇师、战动总会所属的武装部队、新军决死四纵队、工卫旅,也有阎锡山的骑一军、三十五军、十九军、七十一师和东北军骑二军。统一分配新兵,体现了战动总会是统一战线的战争动员组织,又避免了国民党军队的乱抓丁。各县把超额动员的新兵,都补充到一二〇师,有些新兵送到国民党军队后,由于不满意国民党军队的压迫,不少人逃跑出来,自愿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军。所以,实际分配到国民党军队的新兵,只是原计划分配数字的一部分。1938年一年内,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共动员新兵7万名。这年11月底,战动总会在岢岚召开了晋西北二、四、八专区扩大干部会议,续范亭主持了会议。晋西北三个专员公署、三个保安司令部、三个牺盟会中心区、战动总会、晋西北农民救国会、新军代表,还有各县县长、县动委会主任、县牺盟会特派员、县群众组织负责人,共300多人参加。贺龙师长出席大会指导。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副书记罗贵波以一二〇师民运部长的名义出席大会参与领导。阎锡山的代表邱仰浚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的会议。会议形成了建设晋西北根据地的十四项决议,这些决议成为晋西北根据地进步力量发展的合法依据。战动总会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和培养干部的工作。牺盟会名义上是阎锡山官办的群众抗日团体,中共晋西北各级组织和一二〇师也充分依靠牺盟会进行工作。牺盟会组织了各县的游击队,建立了山西新军,培养了上千名干部。牺盟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又在拥护阎锡山抗日的口号下活动。牺盟会在抗战中的作用,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作用。

在共产党领导下,牺盟会、动委会配合一致,使抗日政权逐渐取代阎锡山的旧

政权,改造阎锡山的旧政权。这方面,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由于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队溃退,阎锡山的旧政权人员逃走。由战动总会、牺盟会推荐,通过担任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共产党员武灵初(1938年初,阎锡山用大地主、国民党顽固派杨集贤换掉武灵初)、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共产党员张隽轩推荐,委派由阎锡山任命的一些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如兴县县长张干承,偏关县县长梁雷,文水县县长顾永田,忻县(西部)县长马孔智,汾阳两任县长钟善云、王子承,都是共产党员。当时称这些县长为牺盟县长。

第二种是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了县城后,原来逃走的阎锡山的旧县长又返回来,或者是共产党建立了抗日县政府后,阎锡山又委派来县长,恢复了旧政权。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八路军、共产党没有从阎锡山人员手中夺取政权,和阎锡山的旧政权保持了团结、合作的关系。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群众,在这些地方占有很大政治优势,牺盟会、动委会力量强大,行使了一部分权力。其具体形式是:建立动委会、牺盟会、新军、各群众抗日团体、专员公署、县政府参加的军、政、民联席会议,凡是重大问题都由这种军政民联席会议决定。

第三种是在国民党有大量军队驻扎的县,如五寨、岢岚、临县、河曲、偏关、保德等县,政权名义上是在阎锡山手里,但由于这些县共产党发动了群众,用阎锡山“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打倒了许多贪污腐化、压制民众的区、村长,选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这样就掌握了大部分区、村政权,使阎锡山的旧县长架空。山西新军名义上属于阎锡山军队序列,但新军中有共产党组织,重要的军事政治领导职务由八路军干部和共产党员担任,所以新军实际上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一二〇师并肩作战,为创建晋西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如由战动总会游击队后来改编成的暂一师,有八路军干部150余名和中共地方组织调来的130余名党员担任了领导职务。决死四纵队原来的三个总队军事干部大部分是阎锡山的旧军官,而政治干部全是在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有一批八路军干部调来担任了军事领导职务,而新建的三个团,军政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贺龙、关向应非常重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主动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在作战行动上,经常保持与傅作义、赵承绶、郭宗汾、杨爱源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接触,但主要的是大力扶植牺盟会、动委会、新军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顽固派。

中共晋西北各级组织和一二〇师,在统一战线中,对阎锡山的反共、倒退行为,则坚决与之斗争。如1938年秋,阎锡山提出取消战动总会,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和战动总会中的共产党组织,根据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刘少奇的指示,坚决予以反对,续范亭也进行抵制,战动总会得以继续战斗了一年。1939年6月,阎锡山为控制新军,进行了改编,取消了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新军各部队就以政治主任代行政治委员职权,部队指挥权仍然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1939年秋,阎锡山第二

游击区行署主任赵承绶下令调离共产党员、文水县长顾永田，撤换共产党员、忻县长马孔智，阎锡山的八专区专员陈兴邦派军队强行夺走马孔智的县印。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和这两个县的中共县委发动群众到兴县向阎锡山在晋西北的最高军政长官赵承绶请愿，挽留顾永田、马孔智，控诉陈兴邦勾结日寇、贪污和搞磨擦的罪行。在民怨沸腾中，迫使阎锡山不得不对陈兴邦撤职查办，顾永田“容留原职”。两县的抗日政权和共产党员县长得以保留。阎锡山还在1938年冬下令各县自卫队改由行政机关领导，取消战动总会对自卫队的领导。中共岢岚、五寨县委发动自卫队员集体到岢岚、五寨县政府请愿，坚持自卫队由战动总会领导，由政府拨给经费。岢岚、五寨县政府不得不让步，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这种斗争事例，不胜枚举。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组织，执行对阎锡山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也是非常成功的。利用阎锡山的抗战旗帜，争取合法地位，以阎锡山的各种组织为掩护，埋头苦干，扎实工作，掌握了敌后抗战的领导权。如阎锡山在1938年组织他的高级干部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企图以此控制牺盟会，晋西南共产党组织就批准一部分党员干部加入同志会，从内部摸清其动向，与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团”，共产党掌握了它的领导权，允许一般党员参加，从而控制了这个组织。阎锡山在晋西南建立了“民族革命大学”，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它聘请一部分有声望、文化高的共产党员任教师，共产党在民大建立了党支部，尽量把其中的进步学生介绍到延安学习，或分配到新军、牺盟会工作。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准备反共，晋西南共产党组织就允许新军中的团长、政委、县牺盟特派员去参加，加强了秋林会议中的进步力量，这样，晋西南地区就成为标本的“戴阎锡山的帽子，吃阎锡山的饭，办共产党的事”的抗日根据地。

4、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三个创始人

在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中，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爱国将领、新军领袖续范亭，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功勋卓著，威震敌胆，又使人民获得拿起武器保家卫国的权利，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提高，生活开始改善。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热爱人民，深受晋绥抗日根据地人民爱戴，他们就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晋绥抗日根据地家喻户晓大家都尊敬的人物。

贺龙，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身民主革命，组织农民武装。先后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同年8月末或9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红二方面军总指

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扩展为晋绥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司令员。1942年6月任晋绥陕甘宁联防军司令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同志在晋绥根据地生活、战斗了整整十二年，晋绥根据地人民无不赞扬他。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赞扬贺龙有三条：“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任弼时说“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同志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3年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同志因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残酷迫害，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197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赞扬“贺龙同志是我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造人之一。”1993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贺龙传》出版发行暨贺龙元帅诞生九十七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热情赞扬“贺龙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贺龙同志德高望重，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榜样。”续范亭1940年10月写的《贺龙将军》一诗说：“体国公忠似赵云，坚强活泼更超群。云龙气概难比拟，李牧廉颇两将军。”形象地描绘了贺龙的革命风格和革命精神。

与贺龙共同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关向应，是贺龙的亲密战友。他是终生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关向应，1902年9月10日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家屯。满族人。家境贫寒，年幼时在一家建筑业、报社当童工。他有爱国思想，拒绝为日本人办事。景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年5月，到达上海，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关向应在上海，一面从事革命工作，一面进入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秋天，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革命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25年6月1日关向应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山东、河南从事党、团工作。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后来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武汉深入开展青年工人运动，反对过陈独秀压制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1928年6月至7月，关向应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会